

行走在苏轼的世界里

朝苏记

于坚 作品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
行走在苏轼的世界里

朝苏记

于坚 作品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出版人：胡洪侠

策划/出品：共同体（北京）工作室

责任编辑：高照亮 吴琼

封面设计：有间广告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朝苏记 / 于坚著. — 深圳：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，2016.10

ISBN 978-7-80709-756-3

I. ①朝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苏轼（1036—1101）—
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246049号

朝苏记

Chao Su Ji

于坚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518034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）

印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：3.875

字数：67千字

ISBN 978-7-80709-756-3

定价：32.00元

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深报版图书凡是有质量印刷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电话：0534-2671218

在中国历史上，每个世纪都会出现大诗人。《诗经》时代，杰出的诗人多如牛毛，匿名的大诗人可以采诸野。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（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“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，以采诗，献之大师，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”（班固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）心有灵犀的孔子一选，就得到一部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是匿名时代的集大成者。人类文明有各种各样的开端，从一部诗写成的经书开始，仅中国独有。“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蹄远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”（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）在我看来，文的出现，就是诗的具形，文是先验之诗的升华。如果从言简意赅这种诗的最基本的特性出发，那么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，或者说，汉字的诞生本身就是汉语先民对诗的觉悟。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（刘安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），除了汉语，没有哪一种文明有过这样的记载。文的诞生，就像神的诞生一样，是一个神秘事件。黑暗时代封闭于各个地方的诗意通过文从此可以流布大地，文明开始了。

文明，以文照亮，通过语言觉悟。这种起源导致伟大的诗人这个民族中层出不穷，世所罕见。汉是一个高潮，唐是一个高潮，宋是另一个高潮。宋以后的七百多年中，这种以文为

文明最高标准的趋势逐步式微，到1840年以后，几近消失。压抑了近四千年的商族（黄河流域的古老的部落，首领叫契，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，受封，封地为商）的文化日益发扬光大，最终席卷中国。但是，诗主导的文明已经不可逆转。历经五千年来的最大的变局，文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悖论，商人也不得不通过比商族更古老的文来申明他们的“契”。

今日，现代主义在中国建造一个全新的空间，传统中国的空间世界荡然无存。但是，文继续着，人们依然在用五千年前（在殷墟发掘的甲骨并不能视为文诞生的年代）甚至更早就出现的文命名现代。依然是先知孔子启示的真理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（《论语》）

中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出现在宋。“阴阳割昏晓”（杜甫《望岳》），苏轼就像但丁，站在文明史的阴阳线上。不同的是，但丁站在黑暗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；而苏轼却面对着诗的黄金时代的垂暮，黑暗即将降临。他意识到这一趋势，力挽狂澜，终其一生。

* * *

暮色苍茫，一只乌鸦越过灰色的云层朝向就要沉下地平线的落日。

这是1097年宋朝的京城开封。那个时代此地还没有摩天大楼，在城市最繁华的地带，也可以看见落日和乌鸦。南宋作家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录过这个城市：“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。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；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。时节相次，各有观赏。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，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。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”“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相互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。”（“天长日久的太平，人们都聚集到城市里来。扎着低垂发辮的儿童应合着鼓点跳舞；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从来没有见过武器。各种各样的节日，丰富多彩，各不相同。华灯照耀的夜晚，月亮将至的黄昏，下雪的日子，开花的时节，人们或沿着小路登高望远，或流连于公园池边。大街两旁都是青楼画阁、绣着图案的丝绸窗帘、垂着镶珍珠的帘子。雕刻着花鸟走兽的马车在街道中央走着，阳光下的屋顶和树木闪着光，满街行人身上用绫罗绸缎缝制的衣服散发着香味。阵阵笑声从花园里传来，茶馆酒楼则有一支支乐队在演奏。”“郊区也很热闹，往往人们就在芳香的树下，或者园林中，摆开酒杯盘子，饮酒划拳。年轻人唱歌跳舞，直到黄昏才回家去。”）

天空、大地、人生，其乐融融。在世，生活，生活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，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已达极至。此后的中国生活，都将以此为榜样了。

“万街千巷，尽皆繁盛浩闹。每一坊巷口……多设小影观棚子，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，以引聚之……诸营班院（首都的卫队），于法不得夜游，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，远近高低，若飞星然。阡陌纵横，城闉不禁。别有深坊小巷，绣额珠帘。巧制新妆，竞夸华丽。春情荡扬，酒兴融怡。雅会幽欢，寸阴可惜。景色浩闹，不觉更阑。宝骑骎骎，香轮辘辘。五陵年少，满路行歌。万户千门，笙簧朱彻。市人卖玉梅、夜蛾、蜂儿、雪柳、菩提叶、科头圆子、拍头焦髓……卖鹤鹑骨蚀儿、圆子、髓拍、白肠、水晶鲙、科头细粉、旋炒栗子、银杏、盐豉汤、鸡段、金橘、橄榄、龙眼、荔枝……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
“季春，万花烂漫，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，种种上市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晴帘静院，晓幕高楼，宿酒未醒，好梦初觉，闻之莫不新愁易感，幽恨悬生，最一时之佳况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
“自宣德东去，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。十字街南去，姜行。高头街北去，从纱行至东华门街、晨晖门、宝篆宫，直至旧酸枣门，最是铺席耍闹，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。东去乃潘楼街，街南曰鹰店，只下贩鹰鹞客，余皆真珠匹帛，香药铺席。南通一巷，谓之‘界身’，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。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。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。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，买卖衣物书画，珍玩犀玉；至平明，羊头肚肺、赤白腰子、奶房、肚脰、鹑兔、鸠鸽野味，螃蟹、蛤蜊之类；讫，方有诸手作人上市，买卖零碎作料。饭后，饮食上市，如酥蜜食、枣餠、澄砂团子、香糖果子、蜜煎雕花之类。向晚，卖河萎头面、冠梳、领抹、珍玩、动使之类。东去则徐家瓠羹店。街南桑家瓦子，近北则中瓦，次里瓦。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。内中瓦子莲花棚、牡丹棚。里瓦子夜叉棚、象棚最大，可容数千人。自丁先现、王团子、张七圣辈，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。瓦中多有货药、卖卦、喝故衣、探搏、饮食、剃剪纸画、令曲之类。终日居此，不觉抵暮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
这城市几乎没有闲人，生活的细节如此丰富，每个细节都是一条谋生之道。

“终日居此，不觉抵暮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
生活就是艺术，生活就是文化。人们认为天堂就在当下、此时。生活不是对孤立观念的亦步亦趋，削足适履，而是天人合一，知行合一，形而上就在形而下中，生活世界就是教堂。“人充满劳绩，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（荷尔德林《人，诗意地栖居》）这些西方世界晚近才发现觉悟的真理，在宋代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实践。宋代哲人中曾经阐释过在中国文化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：“推本而言，礼只是一个序，乐只是一个和。只此两字，含蓄多少义理。又问，礼莫是天地之序，乐莫是天地之和？曰：固是。天下无一物无礼乐。且置两只椅子，才不正便是无序。无序便乖，乖便不和。”（程颢、程颐《二程集》）“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，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；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，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。”（《周濂溪集》）钱穆说：“中国的艺术文学，在其本质上，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。……宋以后的文学艺术，都已平民化了，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，总会挂有几幅字画，上面写着几句诗，或画上几根竹子，几只小鸟之类，幽雅淡泊。当你去沉默欣赏的时候，你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。这时候，一切富贵功名，都像化为乌有，也就没有所谓人生苦痛和不得意。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

把茶壶，一边总有几笔画，另一边总有几句诗。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，也往往会绣有诗画。令人日常接触到的，尽是艺术，尽是文学，而尽已平民化了。单纯、淡泊、和平、安静，让你沉默体味，教你怡然自得。再说到房屋建筑，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，他们在院子里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，栽几根竹子，凿一个小池，池里栽几株荷花，或者养几条金鱼。这种设置，看来极平常，但使你身处其间，可以自遣自适。”

（《国史新论》）其实，不仅仅是画画、写诗，天人合一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文化的，“以言行化物，故曰文明。”

（苏轼《东坡易传》）这种艺术化将在场的实用和精神的寄托结合得天衣无缝。生活世界就是教堂，生活世界就是一部诗经。

* * *

那只乌鸦来自开封的御史台，这个地方是宋代的监察机构，由于御史台里种着许多柏树，乌鸦在树间筑巢，因此叫做乌台。1079年8月18日，苏轼被关进这里的监狱，乌台这个本来就有些不详的名字第一次与诗联系起来。苏轼的被捕，在中国历史上叫做“乌台诗案”。在一首诗里，苏轼描写了他被关押在乌台的情况：“去年御史府，举动触四壁。幽幽百尺井，仰天无一席。隔墙闻歌呼，自恨计之失。留诗不忍写，苦泪渍纸笔。”（《晓至巴河口迎子由》）乌台之祸，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。诗人被捕，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。秦朝

焚书坑儒，许多书就是诗集，许多被捕埋掉的儒生也是诗人。

“比事定，重复寻理，十亡其七八矣！”（苏轼《黄州上文潞公书》）即使从幸存的少数作品看，苏轼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。一千年后，人们还在阅读苏轼的文章和诗篇。2000年，法国《世界报》举办了一次评选全世界“千年英雄”的活动，在东西方最近一千年产生的伟人中评出了12人，苏轼名列其中。2014年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，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一文灿然在目：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那些一放学就从口袋里掏出苹果或三星手机看微信的中学生，穿过被汽车拥堵的大街走回家去，乘电梯登楼，回到他们已经西化的房间里，在电视机、抽水马桶、煤气灶、沙发、铝合金窗子……之间，开始背诵这85个汉字。借此，他们才能找回与那个一千年前的中国世界的联系。

1056年8月，20岁的苏轼在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举人考试，揭榜，苏轼名列第二。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在读到苏轼兄弟的考卷后，说：我为后代得到了两个宰相。苏轼就此开始了颇为辉煌的仕途生涯。在一首诗里，苏轼写道：“问汝平生功

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（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）。他没有提到开封。在他关于开封的极少几首诗里，他提到的是开封城的生活世界：“上林珍木暗池台，蜀产吴包万里来。不独盘中见卢橘，时于粽里得杨梅。”（《皇太后阁六首》）

我在他逝世900年后来到开封。乌台已经重新沦为尘土，原址无法查证。在博物馆的橱窗里，元祐党人的石碑的遗照赫然在目〔元祐党人碑，宋崇宁四年，1105年，宰相蔡京主张将宋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大臣列为“元祐奸党”，宋徽宗赵佶批准。“皇帝书而刊之，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，永为万世臣子之戒。”（《元祐党籍碑》）后来又下令将碑文刻石传布全国，“以示后世”。〕碑上刻有309人的名字，第一名就是苏轼。开封城正在拆迁，一个全新的开封城在施工，新起的大部分是西式的楼房和小区。开封城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毁于战乱，但总是被依据经验和记忆重建。依据古代诗词和绘画中的证据推断，至少在宋以降的900年间，开封地区的建筑物大同小异，格局、材料、样式、做工、标准一直被传承，一代比一代更精致耐用。在晚清，已经流行某种巴洛克式的风格，繁琐、装饰性、富于隐喻，但依然是苏轼诗歌写到的那种格局，“对酒卷帘邀明月，风露透窗纱。恰似姮娥怜双燕，分明照、画梁斜。”（《少年游·润州作》）的世界。

在出租车里，经常看见废墟，断墙残壁，如果不明就里，还以为这是战后。一栋栋新楼，与苏轼诗歌中的世界毫不相干，仿佛为外星人所建。大规模的拆迁拆掉的不仅是一片老房子，也拆掉了开封古老的生活氛围。虽然人们也依据古代文献，试图部分重建这个城市，但是材料、空间格局、所有制完全不同。苏轼时代的开封是土木结构的，为手工打造。道法自然、日积月累的结果，建筑有自然形成的部分，也有规划的部分，私房。各家家底参差不齐，显摆露富、独占鳌头为人不齿，出头的椽子先烂。所以城市高低错落，宽窄、建制既要符合礼的秩序，也不一律抹平尊卑贵贱，更随生活之便。水井、寺庙是社区的核心，既要恪守三纲五常，尊卑有序、尊重君臣父子，也要惜老怜幼，为三百六十行、三教九流留出空间。以德为邻，互相照顾，温良恭俭让，亲和无间。“其士农工商，诸行百户，衣装各有本色，不敢越外。谓如香铺裹香人，即顶帽披背；质库掌事，即着皂衫、角带不顶帽之类。街市行人，便认得是何色目。加之人情高谊，若见外方人为都人凌欺，众必救护之。或见军铺收领到斗争公事，横身劝救，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，亦无惮也。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，则相借借动使，献遗汤茶，指引买卖之类。更有提茶瓶之人，每日邻里互相支茶，相问动静。凡百吉凶之家，人皆盈门。其正酒店户，见脚店三两次打酒，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。以至贫下人家，

就店呼酒，亦用银器供送。有连夜饮者，次日取之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
就是皇室，也融入到这个生活世界中：“十六日，车驾不出。自进早膳讫，登门，乐作，卷帘，御座临轩，宣万姓。先到门下者，犹得瞻见天表。小帽红袍独桌子，左右近侍，帘外伞扇执事之人。须臾下帘，则乐作，纵万姓游赏。两朵楼相对：左楼相对郢王以次彩棚幕次；右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。时复自楼上有金凤飞下诸幕次，宣赐不辍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
新城整齐划一，切出来的豆腐块似的，以商业政治为中心，宽阔空荡，适合汽车、显要富人。过客、本地居民倒显得只是摆设了。我住的旅馆附近，就是新建的“清明上河园”，模仿着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也画栋雕梁。只是失去了原图的随意、自然、彬彬有礼，终是过于坚硬、夸张、冷漠、缺乏人气。这个地方没有炊烟，没有“在灯下纳鞋的娘”，月亮也不会转朱阁，照无眠。旅游点，上班时间，许多旅游团打着旗子在里面走来走去，一下班，职工就锁门走人。只是在老城区的某些地段，残余的部分，还可以感受到昔日的生活氛围。

有家包子店里面挤满了人，人们都在吃套餐，这个套餐包括灌汤包子、鲤鱼焙面、藕片、花生糕和紫菜蛋花羹。我坐定，要了一份，某种记忆袭来，这种味道似乎存在于古老的时光，来自外祖母的锅。虽然是在开封，但仿佛回到童年时期的昆明。我记得有时候父母会带我去武城路的一家天津包子店吃狗不理，那家馆子永远被挤个水泄不通，食客甚至站在包子店外面的人行道上品尝。大家狼吞虎咽，被包子溢出的热汤烫得直是咂舌。

开封是古都，在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中，它对中国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某种口味，民以食为天。在中国，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或者营养学的精确配伍，味道中一直保持着最原始的不确定性、神秘主义。人们即使不爱智，也能从对味道的品味中觉悟“道”。吃是活着，味道则是生活。开封幸存的也许只剩下味道了，味道比仿古建筑更令人接近古老的开封。建筑可以拆迁，风景可以改造，但是通过一只只灶秘传下来的口味是无法拆迁的。人们也许在最严峻的时代三缄其口，但禁制永远无法管辖到遗传、调味、火候、手艺，无法规范大米、麦面、盐巴、胡椒……的配方。许多古老的美味传布他乡，已经模糊，改头换面，面目全非，但只要来到开封，立即觉悟，这才是那美味源头。开封的口味不像今日许多名菜那样过度烹调，刁钻

古怪地美化，只为着面子的光鲜亮丽，排场的奢豪讲究，也不是野怪黑乱草草了事。开封的口味有一种中正素朴典雅而又平易近人的市井风格。古典时代的意识形态早已烟消云散，只有那些能够生生、止于至善者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（杜甫《春夜喜雨》），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庸常风俗。

市井一词，在我们时代暗含贬义，生活就是庸俗，甚至罪行。20世纪，故乡批判盛行，“生活在别处”是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的主流，在“文革”达到极端。在中国，否定天必然否定人，观念的革命必然导致生活的颠覆，否定文化必然摧毁生活世界。天人合一就是一，不是天是天，人是人。不像它种文明，形而上——观念与形而下——生活世界是分开的。20世纪流行的故乡批判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，中国有形的故乡已经成为抽象的乡愁。在苏轼时代，市井却是生活的天堂，后世总结的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苏杭，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市井。孟元老如此描写开封的市井：“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；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”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。如要闹去处，通晓不绝。”“正月一日年节，开封府放关扑三日。士庶自早，互相庆贺，坊巷以食物、动使、果实、柴炭之类，歌叫关扑。如马行，潘楼街，州东宋门外，州西梁门外踊路，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，

皆结彩棚，铺陈冠梳、珠翠、头面、衣着、花朵、领抹、靴鞋、玩好之类。间列舞场歌馆，车马交驰。向晚，贵家妇女纵赏关赌，入场观看，入市店饮宴，惯习成风，不相笑讶。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。小民虽贫者，亦须新洁衣服，把酒相酬尔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

* * *

相国寺还在，一位三轮车夫拉着我去，这里依然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实用去处。香客们不是来旅游，参观文物古迹，只是来上香，有一种古老的气氛。一位和尚在为新殿集资，办法是香客交给寺院一百元钱，就将他的名字刻在一片瓦上，日后这片瓦就可以安装在大殿的屋顶。有位香客捐了一百元，他一定要刻字的和尚当着他的面马上将名字刻上去，他担心和尚只是收钱，不留名。他相信菩萨，但不相信和尚。在阴沉的天空下，寺院显得肥大空寂，庄严而犹豫，有几个方头大脸的和尚走过。孟元老说：从前“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，万姓交易。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，珍禽奇兽，无所不有。第二、三门皆动用什物。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，卖铺合簟席、屏帟洗漱、鞍辔弓箭、时果脯腊之类。近佛殿，孟家道冠、王道人蜜煎、赵文秀笔及潘谷墨。占定两廊，皆诸寺师姑卖绣作、领抹、花朵、珠翠、头面、生色销金花样、幞头、帽子、特髻冠子、缘线之类。殿后资圣门前，皆书籍、玩好、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